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的表征、原因及教训

刘子平，孔　扬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呈现出社会治理体系衰败、社会结构功能缺失与社会严重断裂、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丧失等基本表征。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苏联共产党自身建设滞后与退化紧密相连，也与苏联共产党利益整合机制科学化不足、意识形态的高度教条化与封闭性密切相关。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的教训是深刻的，表明执政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其社会整合能力；不断推进利益整合科学化，协调与满足社会各方利益诉求；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教训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6）02-0001-08

收稿日期：2026-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DJ00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研究。

作者简介：刘子平（1979-），男，山东兰陵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孔　扬（2000-），男，山东滕州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2.015

执政党作为联系和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一方面承担着维护社会公正、保护民众的功能，另一方面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巩固政权的功能。由此，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执政党社会整合是指，作为社会整合特殊主体的执政党为推进社会一体化，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或机制对社会子系统及各构成要素之间关系进行协调，进而提高社会良性运转与发展能力的过程和状态。执政党社会整合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是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如果一个执政党社会整合失效，则会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引发社会动荡，直至危及其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治安全。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三十多年来世界各国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如果把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结果统计起来，应当有上百种之多。从表面上看，苏联解体是政治上的改旗易帜，是国家分裂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但实际上，苏联解体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改变，其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子系统深刻变化并最终瓦解的结果”①。其中，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是苏联解体的社会性原因。

一、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的基本表征

苏联解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苏联共产党作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其自身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其社会治理能力下降，社会治理体系崩溃；苏联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缺乏信任，矛盾重重，社会团结遭遇空前危机；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不仅被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广大党员所抛弃，也被苏联各界群众所抛弃。这些现象表明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是失败的，亦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社会原因所在。

（一）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滞后导致社会治理体系衰败

执政党的社会治理能力与其现代化水平紧密相关。执政党如果能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合理需求，那么它就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与时俱进提升

①晏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原因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自己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法治现代化为支撑的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没有法治现代化就无法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无论是在党的系统还是国家政权系统都在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规范体系来推进社会治理。斯大林上台后，党内民主制度被异化，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个人崇拜盛行，干部委任制、终身制大行其道。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反而使苏联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愈加缺乏生机和活力，呈现出越来越衰败的趋势，逐渐无法承担社会有效治理重任。

治理体系衰败的主要表现是非理性行为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社会治理中的非理性行为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开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日益明显。对领导人的过度崇拜与人身依附，对制度的不适当压制，对创新意识的打击和排斥等非理性行为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理性判断和选择能力，而是指其治理意愿与理性制度相冲突相矛盾时，往往是理性制度被抛弃。这就使得苏联国家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他们的判断力和价值观决定了苏联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运行的基本走向。权力带来的利益诱惑是巨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因此，拥有权力的人如果不是因外在强制力或自身原因，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权力。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更替基本呈现了非制度化特征，几乎每位新上台的领导人都会调整甚至抛弃前任的治国理念与治理制度。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也曾试图进行改革，消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往往是改革刚刚推进就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挠，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甚至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这使苏联共产党的公信力和号召力遭到严重削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试图改变前任领导人失败的老路，但最终却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能够在苏联共产党内部进行这种自我毁灭的改革呢？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具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非制度化的，没有任何制约，可以为所欲为，任何制度在它面前都没有约束力。这就导致权力的行使者为了自身行使权力方便而创设出为方便权力行使的“制度”。这种情况下，苏联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缺乏生机和活力，人治等非制度化现象严重，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人民已经不再相信苏联共产党和政府，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经济社会结构失衡导致社会系统功能缺失与社会断裂

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社会领域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成长空间受限，社会活力不足，导致社会只是政治体制的附属品，无法成为独立活动的主体。“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来意义，它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社会领域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①]然而苏联的实际情况是，所谓的社会解放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并没有真正实现，苏联共产党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干预与控制。这种干预与控制是有违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这在苏联共产党执政初期还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依靠强制建立起来的秩序并不长久，所谓的稳定仅仅是一种表象，是非常脆弱的。苏联共产党对苏联社会的干预与控制必然导致苏联社会结构发育不健全，社会结构功能弱化甚至缺失，造成“社会国家化”。从社会变迁角度来看，“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的社会结果，理应带来现代的社会结构”[②]，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的全面干预与控制导致苏联现代的社会结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苏联社会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呈现的是“全能型”执政党形象，它实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控制，超越了一般执政党自身应有的权力活动边界，承担了许多本不应当承担的社会职能，造成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也直接带来苏联社会系统的功能萎缩、功能紊乱，难以正常运转，更谈不上具有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动力和能力。

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使得权力往往集中在党委一把手手里，全党的权力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国家权力已经被垄断于苏联共产党上层少部分人手里，这部分人后又发展成为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党内既得利益集团通过不法途径大肆侵吞和占有国家和社会财富，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享有特殊

①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②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权益。在此背景下，苏联经济社会发展似乎仅仅是那些党内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事情，与其他社会群众关联度不大，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政治参与渠道缺失，社会利益群体分化严重，社会团结程度低下，最终导致社会严重断裂。另外，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开始实行优先发展军工业和重工业的政策，导致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遭到抑制，社会建设严重滞后，日常生活用品长期短缺，从而使苏联人民对苏联共产党逐渐失去信任。

（三）意识形态阵地失守导致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丧失

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价值整合功能，它可以把原本信仰不同、背景不同、社会传统与习惯不同的个体或群体统一到共同价值观上。主流意识形态可以把社会主流价值通过教育、培养、灌输等方式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它对促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秩序良性运转具有重要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远远大于其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价值，可以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重要。坚持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有特点，如果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否定、被抛弃，就意味着其执政地位和执政纲领被否定，就意味着党和国家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丧失。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苏联全体人民的共同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与核心，它强调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苏联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靠的是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苏联人民的共同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苏联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苏联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必然产物，是在苏联本土产生与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列宁主义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被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列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全面掌握了苏共和苏联最高权力，在党和国家层面推行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一统”管理，大搞个人神化与个人盲目崇拜。随后几十年里，虽然苏联共产党在党员人数上不断发展壮大，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却逐渐削弱，导致党的公信力和号召力不断下降。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全面推进所谓“新思维改革”，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堤坎在苏联全线崩塌”[①]。失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共同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乘虚而入，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一个党或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则必然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凝聚人心的纽带”[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指导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放弃了凝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共同旗帜与共同纽带。没有了这面旗帜和这条纽带，苏联共产党就迷失了前进方向，整个苏联也就失去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的主要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既与苏联共产党自身建设滞后与退化紧密相连，也与苏联共产党利益整合机制科学化不足，意识形态逐渐教条化和高度封闭密切相关。

（一）苏联共产党自身建设滞后与退化导致其社会整合能力衰退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整合的核心主体，因此苏联共产党自身素质与能力与社会整合效度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苏联共产党能够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要求，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那么其对苏联社会的整合效果就会十分显著。列宁时期俄共（布）坚持推进党内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内监督，积极推进

---

①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

②姚建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整合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党内制度建设。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逐渐把列宁的党建思想简单化、教条化，致使苏联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导致其自身能力与素质不能满足社会整合的发展要求，其社会整合能力不是逐渐提升而是逐渐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主集中制被异化，党内民主被弱化、虚化，最终形成个人集权制和官僚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靠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靠民主集中制实现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靠民主集中制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靠民主集中制来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保证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①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那它也就失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属性，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②列宁高度重视党内民主，积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本人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但当时国内外复杂环境使党内民主实施还不够全面、充分。斯大林上台后，把革命时期极端复杂环境下的极端集中制运用到革命胜利后的执政活动中，最终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和官僚集权制，苏联共产党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各级党组织的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手里。赫鲁晓夫上台后，针对斯大林党建模式的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与创新，但由于未能从深层次上认识到苏联共产党运行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他的改革并没有跳出原有的党建模式。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对党的建设进行了一些改进，但由于他本人因循守旧、求稳怕变，最后导致党的建设不但没有丝毫改观，反而使个人集权制和干部终身制更加严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打着对党的建设进行“根本革新”的幌子，企图以社会民主化来推动党内民主化，直接抛弃了民主集中制。党内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党内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沟通渠道不畅，中间环节增加，导致信息失真，党内政治体制运转失灵；另一方面压抑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导致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性不高，整个党的素质、创造力和领导力下降，社会治理能力衰退。

另外，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制度实行任命制或变相任命制。这就导致被选拔上来的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或人民负责，普通群众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党群关系疏远。这种干部制度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最终丧失维持国家体制的功能，而且还进一步促进了高度集权体制的瓦解”③。

二是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缺失。“监督机制是制约权力变质的有效手段。”④列宁时期，他比较重视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在党内设立了一个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它来监督监察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全面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权力，他逐渐降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使其由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变为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成为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这样一来就导致原来的被监督制约者成为监督制约者的领导和上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职能基本丧失。后来，曾经分布较广的由普通工农群众参与的监察小组系统也逐渐被取消。这就导致党员和人民群众无法实现对党的有效监督，苏联共产党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拥有无限权力的力量。另外，苏联共产党的监察机构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异己的政治工具，逐渐演变为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机构，它们对权力的监督基本形同虚设。权力失去了制约必然走向腐败，同时，没有了社会监督制约机制，领导人的决策一旦出现问题，便很难纠正。比如，苏联解体前，苏联大多数党员和群众主张保留社会主义，但由于对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权力无法制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联解体。⑤ 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使苏联共产党本来就不健全、不完善的体制无法正常运转，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败之风等泛滥蔓延，对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造成致命性打击，到苏联解体前夜，苏联共产党已经无法整合全社会，民心涣散。

---

①张学斌：《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深刻教训》，《国际政治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②《列宁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第 381 页。

③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38 页。

④王瑜：《苏联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学习论坛》2012 年第 4 期。

⑤季正矩：《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 年第 1 期。

（二）苏联共产党利益整合机制科学化不足导致其利益整合功能难以发挥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本质的体现。”[②]利益包括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在诸多利益类别中，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也是最能把社会各阶层群体凝聚起来的关键因素。因此，利益分配与协调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绩效，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可度与支持度，关系到党的社会整合效度。苏联共产党长期实行的利益整合机制科学化不足导致其利益整合功能发挥越来越差，民众认可度越来越低，最终导致苏联人民抛弃了它。

苏联共产党的畸形经济发展政策不能满足苏联人民的合理利益需求。十月革命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从斯大林开始，为了增强国力，苏联共产党推行“经济军事化”政策，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导致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处于落后状态。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1917年至1987年的70年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9倍，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4.5倍。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最低限度为80％，而消费资料生产最多只占20％。”[③]苏联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长期紧张。苏联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和改善，必然会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信仰产生怀疑，苏联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正如邓小平所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④]苏联共产党的畸形经济发展政策在斯大林后期已经显示出种种弊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在1951至1980年的三十年间，苏联经济一直是呈现出逐年减速的态势。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经济发展形势更为严峻。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消除苏联经济的长期积弊，改变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但他的经济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没有给人民带来经济上的任何好处。

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缺失，进而引发社会成员普遍不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⑤]1930年，斯大林首次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人民群众所得劳动报酬“以他们所投入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⑥]。他们都主张要采取差别工资制，杜绝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在理论上主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政策，在实践上却对普通劳动者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但对高级领导干部实行的却是事实上的“按需分配”，而且领导干部在工资之外还享有其他很多特殊待遇。也就是说，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其付出的劳动量无关，与所在企业或农场的效益无关，但与其是不是领导干部有关，与担任的领导干部级别有关。这就导致领导干部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苏联共产党内部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苏联共产党逐渐沦为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苏联国内，各级领导干部根据各自的政治地位享有不同的特殊待遇，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尽管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缩小了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但由于领导干部另外享有的特殊待遇使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社会结构与阶层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⑦]

面对变化的社会结构与阶层结构，苏联共产党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很难发挥有效整合效力，社会整合难度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岌岌可危的社会整合形势，试图通过经济领域的改革来推动苏联经济发展，弥合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触及了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引发了他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②晏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原因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③王瑜：《苏联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学习论坛》2012年第4期。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⑤《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⑥《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7页。

⑦晏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原因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们的不满。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终结了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使多劳多得成为可能。从经济规律上看这符合社会实际，是合理的。但这在短期也损害了部分工人的经济利益，又会导致这部分工人的不满。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最终没能改变“领导干部享有特权、普通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社会现状，社会中存在的两极化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这就引起大多数社会普通群众的不满，利益整合难以为继。另外，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是靠利益整合在一起的，当他们发现可以有更好的载体实现自己利益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苏联共产党，抛弃了社会主义，选择了资本主义。

（三）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逐渐教条化和高度封闭导致其价值整合功能弱化

意识形态对执政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它可以给执政党提供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支持，引领社会价值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一执政就发挥了价值整合、社会动员与维护执政合法性功能。但当苏联共产党主导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时，就出现了“用意识形态干预一切的政治现象”①，导致意识形态逐渐走向教条化并呈现出高度封闭性，其理论体系在实践中逐渐丧失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调适能力，原本的价值整合功能逐步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阻滞作用越来越明显。

首先，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化和封闭性体现在以教条主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作为苏联本土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列宁赢得了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斯大林利用苏联人民对列宁的深厚感情对列宁主义进行了神化，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教条式的理解与诠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和文本。苏联领导人教条式地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把这种经验模式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本国国情有任何结合与创新，一旦与苏式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便被视为离经叛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革命导师们的一些结论是在特定时间并结合特定情况作出的具体结论，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必须与本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紧密结合起来，而不能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僵化、保守和凝固的，缺乏创新性，导致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与感召力越来越差。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给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致命一击，人们失去了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任，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

其次，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化和封闭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教育流于形式、内容空洞，理论说服力不足。从形式上看，苏联共产党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把意识形态教育全面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更多地注重理论与思想灌输，教育内容空洞陈腐，只是大讲特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导致教育严重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另外，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未能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导致理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应对力与解释力不足，难以让人信服，教育对象产生了逆反心理，宣传教育成为摆设，导致苏联社会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信仰危机。

最后，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化和封闭性体现在否定和排斥非社会主义文化优秀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开放的理论，它并不排斥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然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客观正确对待这些非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反将所有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不符的文化都视为异端。苏联意识形态体现出很强的封闭性，封闭性带来意识形态的脆弱性，这就导致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经不起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接触与交锋。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化”改革后，大量非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苏联泛滥，“苏联式的教条化意识形态便不堪一击，败下阵来”②。

---

①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3页。

②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

三、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的深刻教训

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效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日积月累的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人类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使苏联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与提高。但由于其没有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社会整合能力，对利益整合科学化认识不足，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不够，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与凝聚力不强等原因，最终导致社会整合失败，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执政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社会整合能力

执政党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包括社会整合能力在内的执政能力。苏联共产党社会整合失败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要不断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政策决策正确度和执行力。

加强执政党建设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党员是执政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没有党员参与的执政党是很难长久发展下去的。党员的民主权利必须有科学完善的机制来保障才能避免党员民主权利被侵犯。没有科学的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党内民主权利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以党内民主议事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为核心内容的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体系，从根本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二是要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员行使权利最主要的途径，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因此，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必须保证党的代表大会按章定期召开。三是要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带来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必须秉承“自上而下、平行以及自下而上三种指向的党内监督并重”[①]的建设思路，推进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巡视巡察、上级纪委监督、网络监督、党内民主监督的作用。四是要提高党的制度的执行力与权威性。再好的制度没有执行力也是白纸一张，没有执行力的制度，就会失去权威性。因此，必须提高党的制度的执行力，才能维护党的制度的权威性与约束力，提高制度的威慑力。苏联共产党不是没有制度建设，也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但在个人集权化面前，制度成为摆设，没有真正执行，更谈不上维护制度权威。

（二）执政党要不断推进利益整合科学化，协调与满足社会各方利益诉求

一个政党在获取国家政权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也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必然要求。苏联共产党虽然领导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总体上来看是不成功的，苏联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低效粗放的浪费型，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不明显，广大普通群众“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②]，对苏联共产党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执政党要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如果仅仅把发展为了人民停留在文本和口头上，那就会导致文本与事实之间产生巨大差距，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

执政党在大力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不断推进利益整合科学化。在社会利益分配中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紧密结合，既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基本分配制度，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要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权益。苏联共产党正是由于在分配政策上长期将干部与普通群众差别对待，造成苏联特权阶层的优越生活与广大普通群众的贫乏生活二者的强烈反差，劳动贡献在分配中得不到体现，政治地位成为利益与权益分配的决定性因素。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导致苏联共产党最终被苏联人民所抛弃。因此，执政党必须建立科学化的利益整合机制，协调与满足社会各方的基本利益诉求，既要对社会成员进行兜底保障，又要发挥劳动、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利益分配中所

---

①肖剑忠：《论党内监督制度的完善》，《中州学刊》2016年第10期。

②季正矩：《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

占的比例，使付出与贡献成正比。

（三）执政党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与凝聚力

由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采取了教条式的理解与运用，导致思想僵化缺乏创新，在同非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时处于下风和被动地位，“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理论已经没有战斗力”①。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克服教条与僵化，以开放的态度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因素为己所用，以创新的姿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国家安全，它对“维系社会的团结、政权的稳定都有极大的作用”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科学化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指导思想问题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问题，指导思想的性质决定着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走向。”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而不能是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失败就是最好例证。二是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主流意识形态要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认同，必须更多地关注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④三是要注重重塑传播话语权，改进宣传教育方式，提升宣传教育效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场域的传播，要改变过去强力控制传媒的形式，树立起竞争和对话意识，把理论话语转换为大众话语，不断更新话语体系。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中必须使用生活化的语言，采取灵活多样、潜移默化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认可与认同，才能实现宣传教育内容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Manifestations, Causes and Lessons of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Social Integration

LIU Zi-ping, KONG Yang

(School of Marx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social integratio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failure of the CPSU in social integr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loss of social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serious social frag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loss of political faith and ideals. The failure of the CPSU in social integration wa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working together. I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g and degeneration of the Party's own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scientific mechanism for interest integration and the deification and rigidity of ideology. The less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CPSU in social integration is profound. It indicates that the ruling party must constantly strengthen its own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its social integration ability;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scientization of interest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 and meet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constantly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appeal and cohes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 social integration; failure; lesson

[责任编辑　如初]

①张新平、张博：《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执政体制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

②晏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原因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③张林、刘海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场域定位与现实建构》，《理论导刊》2016年第6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